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宁波盐业史研究

NING BO YAN YE SHI YAN JIU

侯强 著



NLIC2970793015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ZM09.201102

赠书

宁波盐业史研究

NING BO YAN YE SHI YAN JIU

侯强 著



NLIC2970793015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盐业史研究 / 侯强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308-09008-7

I. ①宁… II. ①侯… III. ①盐业史—宁波市 IV. ①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9288 号

宁波盐业史研究

侯 强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文字编辑 李峰伟

封面设计 十木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6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008-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言

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对此,《管子·海王》记有:“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口食盐。”即盐对生命有着特殊的意义,生命的维系和繁衍离不开盐。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盐业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我国是世界上盐业发展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对于盐业,历朝历代无不重视有加。嘉庆《两淮盐法志》就有“盐课关系国赋,最为要紧”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盐业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我国盐业史最新的篇章,也是最辉煌的篇章。

作为海盐重要产区的宁波,其地处我国东南部,濒临东海,境内有余姚江、奉化江交汇,归于甬江,而通向大海,海域总面积为 9758 平方千米,岸线总长为 1562 千米。其中,大陆岸线为 788 千米,岛屿岸线为 774 千米,占全省海岸线的三分之一。海涂和海水资源丰富,发展海盐生产条件优越。自唐代始,宁波即为浙盐的重要产区,有着源远流长的盐业发展历史,是宁波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盐之于宁波,如同血液里的养分一样,已经成为宁波人记忆和宁波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疆域辽阔,只有把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研究透了,才可能把整体中国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宁波盐业史,是把宁波盐业作为中国整体盐业中的一个切片,试图通过解剖这一微小的切片,认识整个中国的盐业历史发展状况,进而深化中国整体史的研究,将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宁波盐业史作为一种长期的历史积淀,可以说,其既是宁波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宁波一笔十分丰厚的经济资源,更是宁波社会现代化转型实现的基础。当前人类已进入海洋时代,全世界掀起了开发海洋的热潮,将宁波盐业史置于区域社会经济史中加以考察,系统探究宁波盐业发展的脉

络,总结其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现代的经验,认识和把握盐业的发展规律,不仅有助于提高宁波盐业经济的运行质量,加快宁波旅游产业的发展 and 夯实宁波人文环境的建设,而且有助于拓宽和加深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盐业作为社会建制中的一个子系统,自近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盐业及其相关问题多有关注,且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是利用前代遗留下来的盐业史资料,编辑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资料书和工具书,区域盐业史研究还远未展开。此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盐业史研究成果是我国台湾地区徐泓的《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史原》创刊号(1970 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区域盐业史研究才兴盛起来,但主要集中于两淮、四川、长芦和河东及广东等区域。除此以外,其他盐区的区域盐业史研究相对较为薄弱。

有关浙江区域盐业史研究,金普森、陈剩勇主编的《浙江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唐仁粤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和乐承耀所著的《宁波古代史纲》(宁波出版社 1995 年版)、《宁波近代史纲(1840—1919)》(宁波出版社 1995 年版)等虽有所触及,但因其各自研究主题和著作框架的局限,对于浙江区域盐业史研究多语焉不详,亟待进一步深化。至于以《浙江省盐业志》(中华书局 1996 年版)为代表的一些浙江省、市、县盐业专志的相继问世,虽大大推进了浙江省盐业史的研究,但由于志书性质的局限,其更多的是为后人研究浙江省盐业史提供宝贵的资料。检阅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有关浙江区域盐业史研究论文,仅见林永匡的《清初的两浙运司盐政》(《浙江学刊》,1984 年第 1 期)、蒋兆成的《明代两浙商盐的生产与流通》(《盐业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和《从顺帝到乾隆两浙地区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日本渡边惇的《清末时期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以与私盐流通的关系为中心》(《盐业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林树建的《元代的浙盐》(《浙江学刊》,1991 年第 3 期)、董郁奎的《明代两浙盐业述略》(《浙江学刊》,1996 年第 6 期)和《先秦至隋唐时期浙江盐业经济探略》(《盐业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董振平的《浙江战时食盐收运处收运述评》(《盐业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及乐承耀的《明代浙东盐业》(《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5 年第 4 期)这 9 篇。这些有关浙江的区域盐业史研究成果,虽既有实证分析,又兼具理论价值,但成果数量少,缺乏完整、系统的研究,而且多侧重于对盐商、盐法和食盐专卖制度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盐业史研究还是

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其实,浙江盐业史有其自身的区域特点和区域特色,开展浙江盐业史研究,对于整个盐业制度史研究是一个补充,对于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一个加强。

具体落实到宁波盐业史的研究,在上述著述中,除乐承耀的《明代浙东盐业》论述较为集中外,其他著述都只是一笔带过。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关宁波盐业史的系统专题研究著述行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待学界弥补。因此,有必要撰写一部专著,全面、系统地反映宁波盐业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弘扬宁波的海洋文化。

本书研究的空间定位,以今宁波市辖区为基本依据,为避免史实遗漏,对行政建制、区划变迁时划出的地域,在其划出前仍将其列为研究范围。研究的基本思路,强调挖掘宁波区域盐业史的内在发展脉络和运行机制,同时努力从宁波区域盐业发展的历史实际中提炼问题意识和阐释模式,从宁波盐的资源分布、生产的形式与要素、产运销经营体制、盐务管理机构、盐务风潮、盐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等方面,按时经事纬结构作一历时性的考察,总结宁波盐业发展的历史特点,展现宁波盐业发展的历史概貌,探究自古及今宁波以盐为中心紫结的社会诸关系及蕴蓄其中的深刻社会内涵。研究的基本方法,以历史文献分析为主,具体主要包括五类文献:官方档案,正史与政书,地方志与盐法专志以及文集、笔记、契约、碑刻等民间文书文献。除文献资料外,口述资料也是本书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通过对众多官方文献和地方文献的解读、分析和辨别,整理出宁波盐业发展的脉络。鉴于盐业属于经济范畴,涉及诸多衡量指标,需要通过数字和计算方可得出客观、精确、科学的结论,所以计量法和比较法也是本书较多使用的方法。

作者

2011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宁波盐业	(1)
第一节 先秦至隋唐时期的宁波盐业	(1)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宁波盐业	(8)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宁波盐业	(15)
第二章 民国初期的宁波盐业	(25)
第一节 宁波盐业的场产管理	(25)
第二节 宁波盐产品的运销与查缉	(33)
第三节 宁波的盐业税收	(40)
第三章 1928—1937 年的宁波盐业	(48)
第一节 宁波的盐业生产	(48)
第二节 宁波盐产品的运销管理	(55)
第三节 宁波的盐产品缉私	(62)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宁波盐业	(69)
第一节 宁波的盐业生产与盐产品运销	(69)
第二节 宁波的盐产品走私与缉私	(78)
第三节 宁波的盐税征催	(84)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宁波盐业	(91)
第一节 宁波的盐业生产	(91)
第二节 宁波盐产品的收购与运销	(98)
第三节 宁波的盐税征收与私盐查缉	(105)
第六章 1949—1966 年的宁波盐业	(113)
第一节 宁波盐业的场区建设	(113)

第二节 宁波盐业的产量与质量	(120)
第三节 宁波盐业的缉私活动	(127)
第七章 “文革”时期的宁波盐业	(135)
第一节 宁波盐业的基本建设	(135)
第二节 宁波盐业机构与运销体制	(142)
第三节 宁波盐产品的购销、运输与仓储	(146)
第八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宁波盐业	(155)
第一节 宁波的改盐归农	(155)
第二节 宁波盐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成果	(160)
第三节 宁波的食盐加碘及其供应	(167)
第四节 宁波盐业的质量管理	(175)
第五节 宁波的盐化工和多种经营	(187)
附录:	
宁波历代主要的盐场	(193)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盐业机构主管人员名录	(197)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制盐企业盐税征收额	(199)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集体和个人所获国家级荣誉奖项	(199)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盐区技术创新成果	(201)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历年盐的放销量	(203)
主要参考文献	(206)
后 记	(210)

第一章 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宁波盐业

第一节 先秦至隋唐时期的宁波盐业

宁波地处我国长江三角洲东南隅,宁绍平原的东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7000年前,宁波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宁波在《禹贡》中为扬州之域,夏、商、周三代皆为越地。公元前222年,秦定楚江南地,置鄞、鄮与句章3县,属会稽郡。^①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鄞、鄮、句章3县与余姚合并,重置句章县。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州,辖鄞、慈溪、奉化、翁山4县。宁波因其濒临东海,海涂和海水资源丰富,发展海盐生产条件优越,盐业生产源远流长,自古即为我国重要的海盐产区。

一、盐产地的分布

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在人类自身的生存、社会的进步和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盐对于原始人类的重要性并不比火差。因为火的发现仅仅是导致人类由‘生食’到‘熟食’

^① 乐承耀撰文认为,秦没有设置鄞县,鄞县建置于西汉。参见《鄞县建县时间考》,《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4期。

的一种文明进步;而盐的作用则在于维系人类的生命、生存和发展。因此,较之于火,盐更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物质。”^①正由于此,打开中国历史的画卷,历朝历代无不对盐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盐可谓是我国古代最稳定、最重要的专卖商品。这从“盐”字的构造也可见一斑。“盐字现在简化了,本来写作‘鹽’体现了煮海的行义,盐字从卤,卤上有人,卤旁有臣,下有器皿,这就是说盐的制作是政府官员(臣)的监督下取海水(卤)在器皿(皿)上煮盐。这不仅展现了盐的生产流程图,还展现了盐的国家专管专卖。”^②

中国盐业资源的开发有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宁波海盐生产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据《越绝书》卷8云:“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明确记载在春秋越国之时,勾践为管理盐业曾设有盐官。这是最早的有关我国东部和南部漫长沿海地区设置盐官的先秦文献。其所记载的地区,恰好包括今浙东宁波地域。陈桥驿据此而研究指出:“既然越语称盐为‘余’,而这一带的越语地名除朱余外,尚有余杭、余暨、余姚三处,显然也都与盐有关。由此可知,今翠屏山丘陵北麓诸盐场,从春秋越国起就已经存在,至今已有二千余年历史。”^③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吴地时,也说吴地从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以来就有“东有海盐之饶”之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春秋时期江浙沿海地区生产海盐并非虚言。据《宁波盐志》记载:“鄞置县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为会稽郡属县,县治在今鄞县区宝幢同岙村,旧称贸山同谷口。秦时鄞县范围包括今鄞州区、江东区、海曙区和北仑区的大部。……在秦置鄞县前,当地居民就在今鄞州区宝幢一带山下进行包括鱼盐的‘海中财产’贸易。因此,在秦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鄞之同谷附近的沿海地区就已有海水制盐和食盐的贸易。”^④综合上文所述,再结合《管子·地数》所言:“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煮海水为盐,已经不限于所谓‘青州’(山东半

① 柴继光:《中国盐文化》,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黄继林:《从盐说开去》,赵昌智主编:《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三辑),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③ 陈桥驿:《序二》,《慈溪盐政志》编纂委员会编:《慈溪盐政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④ 《宁波盐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盐志》,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岛),北面已扩展到了辽东半岛,南方更达到了江浙沿海地区。”^①

春秋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宁波海盐生产也进一步发展起来。汉初,今宁波辖区为吴王濞属地,是重要的海盐产区。有关于此,曾仰丰曾言:“江、浙场区,古为吴、越要荒,汉以前,古籍所载盐事,无专指淮、浙者,至汉吴王濞都广陵,煮海饶国用,淮、浙煎盐,始见于纪载。”^②因此,《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汉初情况时,即称吴地“东有海盐之饶”。但今宁波辖区沿海一带还未成为汉代的最主要产盐区。这表现在《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从西汉中叶至王莽时所置的36处盐官中,还没有一处是设在今宁波辖区的。

截至唐代,我国海盐生产无论是其产地数量,还是其产地分布,相比于汉代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汉代沿海地区主要产盐县只有19处,而唐代增加至35处,约是汉代的180%;另一方面,唐代北方和南方产盐县的数量比例与汉代相比呈倒置态势,海盐产地的重心已由北方移向了江淮。^③随着唐代盐业生产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宁波的海盐生产也趋于繁荣,并发展成为当时主要的海盐产区。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江南道海盐产地分布于苏州嘉兴、杭州盐官、越州会稽、明州鄞县、温州永嘉、台州黄岩与宁海,及福州侯官、长乐、连江、长溪和泉州晋江、南安等8州13县。再结合宋人施宿《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在海盐产地8州13县中,涉及今宁波辖区的有越州的余姚、明州的鄞县、台州的宁海。”^④这也被其他一些文献进一步印证。据慈溪沈师桥《沈氏宗谱》记载,今慈溪的沈师桥一带,“秦则海也,汉则涂也,唐则灶也。”可见,唐代沈师桥一带已有人设灶煎盐。又据清周庆云的《盐法通志》记载:“唐代宗(公元762—779年)时为天下有盐之县一百五,江南至彭水县十二水。”其中,就列有宁海为产盐县之一。再结合宋嘉定《赤城志》中“长亭盐场在县东一百二十里。旧在港头,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徙今地”的记载,唐代宁海产盐区当在今宁海水车、越溪和城郊三地。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今岱山县一度隶属翁山县(今定海)富都监,归属明州。据《岱山县盐业志》记载:“唐乾元至永泰年间(公元758—766年),境

① 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②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第51页。

③ 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④ 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7页。

内居民已利用滩涂,削土取咸煎盐。”^①此时,浙东已被誉为“蜚税鱼盐,衣食半天下”。^②

宁波的海盐生产在五代十国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今宁波辖区内甚至因鱼盐之利而设置了新县。据《太平寰宇记》卷98·《江南东道十》记载:“梁开平三年,吴越王钱鏐以地滨海口,有鱼盐之利,因置望海县,后改为定海县。”足见今宁波镇海区、北仑区境内盐产之丰富。

二、盐业生产与流通

盐分为自然盐和人工盐。汉人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盐”就解释:“鹵也,天生曰鹵,人生曰盐。”人类对自然盐的发现和最初利用,当在遥远的洪荒时代。但截至商人,在他们的头脑中,还只有“鹵”(自然盐)产于西方,而没有“盐”(人工盐)产于东方的概念。这具体表现在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中,不仅无“盐”字,而且“鹵”和“西”还仍为一字。早期的人工盐主要有海盐和井盐两大类。在人工盐中,因海盐相对于井盐来说,其资源暴露,易于开采,所以利用海盐的生产应先于井卤制盐。我国海盐生产源于何时,史籍虽并无确切记载,但透过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我们还是能影影绰绰辨别出一点痕迹来。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对此,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指出,“许说盖出《世本·作篇》”。《世本》为战国时史官所撰,其记载当有所根据。惜宋时《世本》已散佚,好在今《图书集成》中收有辑本,但诸辑本中并无“古者”、“初”、“海”等字眼。从许慎“古者”这一含糊用语来看,显然汉时的人们已对“宿沙”的记忆模糊了,但结合段玉裁的注及上文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大约商周之际,先民应已掌握了海盐的生产技术。这也被新近考古资料进一步印证。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和寿光市博物馆联合对山东省寿光市大荒北央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是西周前期煎煮海盐的聚落。^③

自古及今,因海盐来源不竭,其一直就是我国盐业生产的主项。宁波与海为邻,自然也是我国海盐的重要产区。宁波海盐的生产方法是“煮”。

① 《岱山县盐业志》编纂领导小组编:《岱山县盐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② 杜牧:《授李纳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文苑英华》卷408。

③ 王青、李瑞成、郑滨海:《山东寿光市大荒北央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2期。

《史记·吴王濞列传》就说：“(刘濞)煮海水为盐。”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说：“按东南之盐，煮海而已。”从先秦至隋唐，宁波制盐应经历了从最初的直接煮海水成盐，到后来发展成先将海水制成卤水，再将卤水煎熬成盐的演变。

直接以海水煎熬成盐，发生于我国海盐生产技术水平尚处于较原始阶段之时，其是我国先民人工制盐最初的必然选择。但是，煮海为盐是不可能一直停留在直接用海水煮盐这个原始阶段的。人们在长期的海盐生产实践中，随着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从直接用海水煮盐进步到制卤煮盐。那么，我国先将海水制成卤水，再将卤水煎熬成盐的淋煎法海盐生产技术的采用始于何时？根据有关考古资料研究显示，商周时期，山东北部生产海盐已采用淋煎法。^①至于宁波历史上采用淋煎法海盐生产技术起源于何时，由于史料阙如，一时尚难以说清楚。不过，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刘晏任盐铁使时，“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曠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显然，唐代已采用了淋煎法中的刮泥淋卤制盐，此法并因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有力推动而开始被广泛采用。以此类推，宁波历史上大规模采用刮泥淋卤制盐的生产技术自当也不会晚于此时。

盐业生产的发展必然催生盐业贸易。秦时，宁波盐业生产和贸易已趋于活跃。据宁波早期地方志宋宝庆《四明志》卷1·《风俗》记载：“古鄞县乃取贸易之义，居民喜游贩鱼盐。”可见，古鄞县时宁波的沿海一带，其经济活动带有浓重的海洋意味，鱼盐生产和贸易已相当兴盛。这也被此后元至正《四明续志》的记载所印证。其卷1·《土风》在谈到明州乡土风俗时提及“《会稽典录》曰：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是皆以会稽一郡风俗言者，而四明于是概见焉尔”。

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经济地理的变动，两淮、江南等地逐渐成为海盐生产的重心所在。截至唐代，宁波盐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此时，全国盐业产地呈现出淮浙海盐竞相发展的局面。如，在玄宗《幸东都制》中，即有“引鱼盐於淮海，通杭纆於吴越”的夸耀；在杜牧《樊川文集·上盐铁裴侍郎书》中，开篇即呼称“盐铁重务，根本在于江淮”。显然，淮浙海盐的生产已成为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所控制和依赖的最重要的食盐来源。这也被

① 王青、朱继平：《山东北部商周时期海盐生产的几个问题》，《文物》，2006年第4期。

同时代及其后的其他文献记载进一步印证。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至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刘晏领东南盐铁使时,“吴越扬楚,盐廩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值得注意的是,在刘晏设置的十监中,据宋人施宿《嘉泰会稽志》记载:“唐越州有兰亭监官场五,曰会稽东场、会稽西场、余姚场、怀远场、地心场,配课盐四十万六千七十四石一斗。”其中,余姚场即石堰场,今属宁波慈溪市。又,唐代宗时,刘晏为管理盐业设置了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个盐监,以及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大转运场,以负责食盐之产销。不难发现,刘晏所建的十监四场,主要设置在淮浙一带。其中,富都监当时属于明州鄞县。^①唐代包括今宁波境内的淮浙海盐生产如此之繁盛,以致在唐代行政区域中,“除河北、河南道的十余州多食河北、山东盐,江南道福、闽数州多食福建海盐,以及岭南道诸州或分食岭南海盐外,其余州郡恐都以销售淮、浙盐为主。因此淮浙盐的流通遍布东南半个中国”。^②

三、盐业组织和税收

盐乃“国之大宝”,是我国古代国家财政赋税收入中的一项重要来源。正因如此,自先秦至隋唐,我国历朝统治者无不极力控制盐产资源,独占盐业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起具有各自鲜明时代特点的盐业组织和税收管理体制。

据《越绝书》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行政管辖范围覆盖今宁波区域的越地就设置了盐官。这说明截至春秋,官府已对盐业加强了管理。其盐官具体执掌如何,因传世文献记载过于简略,今人已难窥其详。但据曾仰丰研究,“春秋时,除齐国用管子之法,行专卖制度外,其他各国之盐法,大都循周之旧,采用征税制”^③。若此言不虚,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地所设盐官的主要职责当是征收盐税。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沿用了原秦国的盐业政策,在产盐的郡县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吏,进一步加强对盐铁等山林川泽资源和产品的控制。《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秦“颍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何谓“颍川泽之利”?陈直解释为“采取包

① 参阅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② 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③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第4页。

商制”^①，即秦王朝将盐铁的生产销售权授予少数大商人垄断经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盐铁的产销。秦时，今宁波区域是否设置了专门的盐业管理机构和官吏，史无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营盐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并被课以重税。

汉初，为医治战争创伤，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了与秦王朝截然不同的盐业政策。《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即汉初将山泽之利，尽行开放，产制运销，听民自由，只收盐税。但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王刘濞在东海之滨却乘机“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由此可知，此时宁波区域的盐业生产应是封国主导下的“地方官营”，即煮盐作坊乃官营，且煮盐工多由其他郡国的“亡命者”充当。截至武帝时，宁波区域盐业生产中的“地方官营”被朝廷官营所取代，朝廷直接垄断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危机，“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釡左趾，没入其器物”。即禁止私营，垄断食盐的产销，实行食盐官营专卖，且煮盐工由招募来的、略具资产的、具有自由身份的农人充当。

东汉光武中兴，盐铁管理体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据曾仰丰研究，“东汉时，光武除专卖之法，弛私煮之禁，任民制盐，自由贩运，于产盐较多之郡县，设置盐官，征收盐税”，又“南朝东晋行征税制，宋、齐、梁、陈，沿而未改”。^② 以此观之，东汉截至南朝，宁波盐业当多为纵民私煮，立官以课税。

隋唐时期，我国盐业生产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开放盐禁，任民煎熬，行免盐税制。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复行征收盐税。安史之乱后，为解决财政困难，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出任盐铁使，推行盐法改革，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专卖制，专卖的法令也更为系统和严密，并规定“盗煮私盐，罪有差”^③。此时，将从事盐生产者称为亭户或灶户，他们有向政府登记取得的盐籍，除正赋外免除杂徭，是制盐业的最基本生产单位，归隶盐铁使。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刘晏继续改革盐法，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盐官就场向亭户收储食盐，再将盐税加入卖价，售与商人销售，听由商人贩运销售各地，不再征税。隋唐时期，作为当时主要海盐产区的宁波，其盐业生产组织与

①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②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第4—5页。

③ 《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

税收状况也应大抵如此。有关于此,上文提及的属兰亭监管辖的余姚场以及明州鄞县富都监的设置即是明证。

五代时期,盐铁管理沿用唐制设立盐铁使。是时,“钱镠据浙江立吴越国,受后梁(公元907—923年)、后唐(公元923—936年)册封王,兼两浙盐铁发运诸使。钱镠沿原唐盐法,于明州置榷榷场院,由官府自卖,乡村各处准许通商,两法并行,以官卖为主”^①。与之同时,又实行计口授盐,在乡村称“蚕盐”,在城镇称“屋税盐”,依夏税限,随丝纳钱,并对私盐施以严科峻法的打击,实施了极具地域特征的食盐政策。据《五代会要·盐铁杂条上》记载,所有折博每年人户蚕盐,不许挟带一斤一两入城,以免侵夺榷榷课利。如有违犯者,将根据情节处以各自不等的刑罚。五代时期,作为吴越国一部分的宁波,自当也实施了上述食盐政策和盐法。另“五代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为防止食盐越区运销,开始划定行盐区域,两浙除供浙江省外,又供应江苏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属;安徽之徽州、广德两属;江西之广信一属”^②。此时,宁波生产的海盐当也在上述范围内运销。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宁波盐业

宋元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今宁波称明州奉国军。此时,明州统辖鄞县、奉化、慈溪、定海(今镇海、北仑)、象山、昌国(今舟山市)6县。^③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置沿海制置使,辖温、台、明、越4郡。南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升明州为庆元府。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庆元府为庆元路,属浙江行省,领奉化、昌国2州,鄞县、慈溪、定海(今宁波市镇海区、北仑区)、象山4县。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又在甬东隅建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这一时期的宁波,其海盐生产借助历代积累的经验,在隋唐发展的基础上,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① 《宁波盐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盐志》,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页。

② 《浙江省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盐业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页。

③ 北宋之时,余姚属越州统辖,宁海归属台州。

一、盐业产地与产量的扩大

宋代,宁波的盐业生产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其产盐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沿海、沿江一带及舟山群岛,遍布于今宁波除奉化以外的各区、市和县,产量预定与实产考绩,均有具体规定。据宋宝庆《四明志》卷6·《盐课》记载,北宋之时,当时宁波统辖的旧七场为:昌国盐场、岱山盐场、东江盐场^①、玉泉盐场、大嵩盐场、清泉盐场^②和长亭盐场^③。加之运盐也归属当时宁波的鸣鹤盐场,共8个盐场。其中,昌国盐场额盐为一万二十六袋一石九斗零,岱山盐场额盐为一万四千六十袋一石一斗,东江盐场额盐为一万二十六袋一石一斗零,玉泉盐场额盐为五千二百二十袋,大嵩盐场额盐为二千六百八十袋五石六斗零,清泉盐场额盐为四千九百八袋,长亭盐场额盐为五千袋。此额盐量大致反映北宋明州的盐产量。南宋之时,当时宁波统辖的盐场又增设7场。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在定海县创置了龙头盐场。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创建了穿山盐场。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创建了高南亭盐场,并将杜渚盐场拨隶当时宁波盐场寄卖。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创建了玉女溪盐场和长山盐场。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创建了芦花盐场。其中,龙头盐场额盐为一千八百七十七袋二石,穿山盐场额盐为三千袋,高南亭盐场额盐为三千六百袋,杜渚盐场额盐为四千一百六十六袋四石,玉女溪盐场额盐为一千六十袋,长山盐场额盐为三千袋,芦花盐场额盐为三千六百袋。此额盐量大致反映南宋庆元府的盐产量。

宋初,宁波北部的盐产地原在大古塘一线,以后随海水北却,盐区也就随势逐渐向北推移,现今已距海岸40余里。据《宁波盐志》记载,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自余姚的云柯至上林(今余姚历山至慈溪洋浦)开始修建莲花塘(后称大古塘)后,盐场位置逐次向北推移。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大古塘修成后,大古塘内盐田全废,盐区移到大古塘外。宝庆(公元1225—1227年)及元大德(公元1297—1307年)期间,两次堤毁,海水入

① 据宋宝庆《四明志》卷20·《盐场》载:“东江盐场,县东八里。又有子场曰晓峰,在县西十二里。‘晓’字本避英宗皇帝庙讳更名。屯田郎官柳永耆卿尝为监场,有长短句题壁,因兵火失之。”

② 据清雍正六年李卫纂《敕修两浙盐法志》卷2载:“清泉一场,在镇海县,崇宁三年置。”

③ 据宋陈耆卿的《赤城志》“宁海条”载:“长亭盐场在县东一百二十里,旧在港头,大观三年徙今地(今额隶庆元府)”,即长亭场乃北宋时置。